

中国

◎顾问
李 新
廖盖隆

第 5 卷

20世纪全史

全民抗战

王秀鑫 李 荣 / 著

1937-1945

1937-1945

0107079

K2

3-5



201070795

中国

第5卷

20世纪
全史

全民抗战



王秀鑫 李荣 / 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

(京)新登字 083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全民抗战/王秀鑫,李荣著. —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1
(中国 20 世纪全史 第 5 卷)

ISBN 7-5006-4259-8

I. 全… II. ①王…②李… III. 抗日战争 (1937~1945) —
历史 IV. K2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15902 号

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发行

社址:北京东四 12 条 21 号

邮政编码:100708

网址:www. cyp. com. cn

发行部电话:(010) 64010813

河北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850×1168 1/32 26.5 印张 5 插页 659 千字

2001 年 5 月北京第 1 版 河北第 1 次印刷

印数:1—4,000 册

定价:66.00 元

本图书有任何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处联系调换

联系电话:(010) 64033570

《中国二十世纪全史》

顾 问

李 新 廖盖隆

主 编

黄修荣

副主编

刘益涛

策 划

胡守文

特约审稿

蔡 云 林君雄 滕明道 王溪元 李 萍

责任编辑

冈 宁

1900-2000

目 录

第一章 全民抗战的开始	(1)
一、日本图谋扩大侵华战争	(1)
二、卢沟桥事变.....	(13)
三、全国抗日救亡运动进一步高涨.....	(26)
四、南京国民政府对卢沟桥事变的态度.....	(39)
五、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	(51)
六、国民党的抗战指导路线和战略方针.....	(65)
七、中国共产党的抗战路线和战略方针.....	(73)
 第二章 两个战场的配合作战	(85)
一、八路军开赴抗日前线与平型关大捷.....	(85)
二、太原会战	(100)
三、淞沪会战和南京保卫战	(111)
四、台儿庄大捷和徐州会战	(124)
五、敌后战场的开辟	(134)
六、陕甘宁抗日根据地的巩固	(147)
七、武汉会战和广州会战	(157)
 第三章 抗战由防御转入相持	(169)
一、日本侵华政策的调整	(169)
二、汪精卫集团叛国投敌	(180)
三、国民党军事政治方针的调整	(193)
四、正面战场的对日作战	(204)

五、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发展	(216)
六、百团大战	(234)
七、沦陷区人民的反日斗争	(248)
第四章 国共团结抗战危机的克服	(262)
一、蒋日香港、澳门谈判	(262)
二、打退国民党顽固派的第一次反共高潮	(273)
三、回击国民党在思想战线上的攻势	(284)
四、宪政运动的兴起	(297)
五、正确处理皖南事变	(309)
六、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建立	(324)
七、全民族抗战局势的重新趋向好转	(336)
第五章 抗战前期各界人民的抗日斗争	(351)
一、社会各界、各团体的抗日斗争	(351)
二、民主党派抗日斗争	(364)
三、宋庆龄创办保卫中国同盟	(374)
四、抗日文化运动的开展	(386)
五、少数民族群众积极参加抗战	(399)
六、海外华侨支持祖国抗战	(411)
七、国际友人支援中国抗战	(422)
第六章 坚持对日作战	(432)
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	(432)
二、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坚持抗战	(459)
三、敌后军民的反“清乡”、反“扫荡”斗争	(475)
四、国民党军的游击战	(491)

第七章 抗日军民在困难的环境中坚持斗争	(505)
一、敌后根据地战胜严重困难	(505)
二、民盟的初期活动,大后方的经济文化建设.....	(542)
三、日军暴行和沦陷区人民的反抗斗争	(562)
第八章 走向胜利的中国战局	(581)
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转折	(581)
二、中国军队的缅北、滇西反攻.....	(602)
三、鄂西战役和常德会战	(620)
四、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恢复和发展	(625)
五、敌后战场的局部反攻	(643)
六、中共领导下的沦陷区人民的斗争	(655)
第九章 人心向背的巨大变化	(680)
一、豫湘桂战役的失利	(680)
二、向河南等敌后进军	(694)
三、大后方日益高涨的民主运动	(705)
四、国共西安、重庆谈判.....	(718)
五、中共提出联合政府主张	(728)
六、美国介入国共关系	(745)
七、国民党及其他党派的建国构想	(759)
第十章 中华民族取得抗战的胜利	(776)
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发展及苏联对日宣战	(776)
二、对日大反攻	(786)
三、日本投降和远东大审判	(806)
四、抗战胜利的意义和作用	(830)
主要参考书目	(834)

第一章 全民抗战的开始

1937年7月7日发生的卢沟桥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大举进攻中国本部的开始,也是中国全民族抗战的开始。

一、日本图谋扩大侵华战争

1. 日本扩大侵华战争的企图

灭亡中国,变中国为独占的殖民地,是日本帝国主义早已确定的方针。1935年华北事变以后,日本加紧准备对中国本部大举进攻,妄图迅速灭亡全中国。

1929年至1933年,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危机的创伤尚未恢复,1937年下半年又爆发了新的经济危机。这次危机首先从美国开始,随之蔓延到英、法等国。经济危机使各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帝国主义国家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以及帝国主义与殖民地附属国之间的矛盾,更加尖锐化。德、意、日三国,为了逃避经济危机的袭击,为了满足向外扩张的野心,便把本国的国民经济转入战时轨道,在加紧镇压其国内人民革命运动的同时,首先向防御力量比较薄弱的国家发动侵略战争,并积极准备发动重新分割殖民地的世界大战。日本帝国主义扩大侵华战争,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进行的。

同时,日本帝国主义抓住国际有利于扩张的形势,决心扩大侵

华战争。20 世纪 30 年代中期,德、意、日法西斯国家不断扩张和发动局部侵略战争一再得逞,东西方法西斯国家相互勾结,形成侵略性的同盟,在战略上策应配合。1936 年 10 月 25 日,德、意两国在柏林签订了秘密协定,规定意大利不干预德国兼并奥地利,德国承认意大利侵占阿比西尼亚,并在重要的国际问题上采取共同方针,形成“柏林——罗马轴心”。11 月 25 日,德、日两国在柏林签订《反共产国际协定》,规定双方在反苏反共的侵略行动中,相互谅解和支持。

日本正式加入了国际法西斯阵营,从而为发动大规模的侵略战争找到了盟友。

德、意、日三国的侵略行径,既威胁着受侵害国家的利益和安全,也威胁着英、法、美、苏等国在这些地区的利益和安全。美、英、法等国,经过经济危机的打击后,经济开始复苏,但 1937 年又出现了新经济危机的征兆。由于国内经济政治问题的困扰,力不从心,于是对法西斯国家的侵略采取了“中立”、“不干涉”的姑息、纵容的绥靖主义政策,力求保住本国的既得利益,缓和与日、德、意的矛盾。1937 年,美国对日出口总额为 2.8 亿美元,其中战略物资石油及石油制品为 0.42 亿美元,废钢铁 0.37 亿美元,日本占美国当年对外贸易比重的第 3 位。美国对日本的军事物资的输出,使日本获得发动扩大侵华战争的大宗战略物资。

苏联在 30 年代中期,针对德、意、日法西斯国家的扩张侵略,实行反对侵略的和平政策。对意大利侵略阿比西尼亚的行动,苏联建议采取有效手段给予反击。当西班牙遭受德、意法西斯武装干涉时,苏联派出志愿人员,并以贷款、武器装备、粮食、药品、被服等物资,有力地援助了西班牙人民的斗争。苏联还提出了建立欧洲集体安全体系的主张。对日本的侵华行动,苏联从同情被压迫民族和自身安全出发,进行了正义的谴责和揭露。但是,由于英、美、法等国没有支持苏联关于采取联合行动对付法西斯侵略的建议,苏联为

了本国的利益,亦尽量避免与法西斯国家激化矛盾,除在道义上同情和支持中国外,对日本采取了中立主义的立场,并于1935年3月将中东铁路非法卖给日本,以求改善苏日关系。

日本法西斯看到,被侵略国家在力量对比悬殊的情况下,孤军奋战,抵抗法西斯国家的进犯,很少得到甚至没有得到国际社会的有力支援。日本对外扩张侵略的气焰更加嚣张,便抓住国际有利于扩张的形势,决心扩大侵华战争。

2. 日本扩大侵华战争的准备

1935年华北事变后,日本大力进行以征服中国和称霸亚洲为主要目标的扩军备战。

在经济上,实行国民经济的全面军事化。

为了加速战备,日本政府大力发展军事工业,向军工企业投入大量资金,并给予巨额补贴和优惠待遇。1937年日本对军事工业的投资22.3亿日元,占当年工业投资总额的61.7%。1937年的军工生产较1936年有了大幅度的增长:炸药的生产量由6200余吨增至1.9万余吨;轻兵器的生产金额由630万日元增至1000余万日元;航空兵器由100余万日元增至200余万日元;战斗车辆由200余万日元增至了300余万日元;整个陆军兵器的生产额,1937年为1936年的两倍^①。

为了使整个经济为战争服务,日本政府通过颁布各种法令把工业、农业、金融、贸易等国民经济各部门控制起来,为军需生产服务。在对外贸易方面,争取增加外汇收入,进口本国所缺少的战略物资和军事技术装备。

加紧对殖民地的掠夺是日本加速战备的重要手段之一。“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占领了中国东北,大肆掠夺东北的人力、物

^① 罗焕章、支绍曾著:《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军事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28页。

力、财力,以保证日益扩大的侵略战争的需要,变东北为战争资源的基地。1935年11月,原日本关东军参谋片仓衷说:“满洲经济政策的最大问题,就是朝着1935年、1936年的国际危机这个目标做好准备,换言之,就是满足国防要求”^①。也就是说,日本为了加速战备,加紧了对中国东北的经济掠夺。1936年11月,日本全面掠夺东北战争资源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出笼,1937年4月开始实施。这个计划的主要特征是加速扩大钢、铁、煤、电力、液体燃料等资源的生产能力;发展军事工业,扩大汽车和飞机的生产规模;新增投资完全用于工矿业。1937年5月1日,日伪公布了《重要产业统制法》,把原来属于自由经营的纺织、水泥工业、啤酒、火柴制造业、制粉、制糖、油房业等列为重要产业,不经伪满政府许可不许经营。这就将经济统制由重工业扩展到轻工业,特别是有关人民生计的、有众多民族资本的农产品加工工业,扩大了产业统制的范围。

在军事上扩军备战,增强了军事实力。据统计,1937年上半年,日本陆军有常设师17个、独立混成旅、骑兵旅和守备队10余个,共60余万人。日军现役人数虽不多,但预备役、后备役、第一、第二补充兵数量总共有400余万人。特别是日本陆军师编制内的特种兵数量大,与中国整编师相比,全师总兵员多一倍,步兵武器装备多1—2倍。

1937年上半年,日本海军编有4个舰队,拥有包括航空母舰、战列舰和重巡洋舰等大型军舰在内的舰艇280余艘,排水总量达110余万吨。其中第三舰队担负侵略中国的任务,司令部设在中国上海,司令官是长谷川清中将。中国海军与之相比,力量较弱。

1937年上半年,日本陆海军共有航空中队91个,各类飞机2625架;当时中国只有各类飞机600架。日本空军与中国空军相

①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科研部编:《抗战外交》,中共党史出版社1996年版,第511—512页。

比,也占有较大的优势。

而且,日军为适应侵略战争的需要,强化军队训练,并以武士道精神为其支柱。因此,日军的组织指挥力和战斗力较中国军队为强。

在政治上,进一步加强了法西斯军事独裁统治。早在1931年,由于日本老财阀三井、三菱、住友、安田、大仓、浅野、川琦、古河等与政党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军人法西斯势力是反对老财阀而支持新财阀的。在法西斯的支持下,日产、日曹、日氮、森、理研等新财阀借助于经营军事工业而迅速崛起。1933年,在军事工业暴利的诱惑下,老财阀与政党的关系逐渐冷落,开始转向支持军部。军部为了取得实力雄厚的老财阀的支持,也积极向老财阀靠拢。1936年,已形成了“军财联袂”的局面,从而为实现军部独裁、扩大侵华战争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基础。

为了确立军部在内阁中的统治地位,1936年2月26日,日本法西斯青年军官发动军事政变,袭击首相官邸、内阁大臣私邸和首都警视厅等重要机关,杀死了内阁大臣斋藤实、藏相高桥是清、教育总监渡边锭太郎等人,占领了陆军省、首相官邸,扬言实行“昭和维新”,企图建立为垄断资本和军部服务的军事独裁。政变虽遭到镇压,但军人法西斯势力借叛乱要挟政府说:“政治的主导权如不让给军部,就会发生第二、第三个‘二·二六事件’!”^①政变后上台的广田内阁,对军部惟命是从,强行建立战时体制,“全面革新政治”、推行“庶政一新”、“广义国防”的政策,恢复陆海军大臣、次官均由中將以上现役军人担任的制度,从而确立了军部对政府的支配特权,即确立了日本法西斯政权,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各个方面,都涂上了军国主义色彩,将日本引入准战时体制。可见,“二·二六”事件后,确立了军部在内阁中的统治地位。3月9日,

^① [日]户川猪佐武:《昭和外交史》,第143页;转引自武月星等:《卢沟桥事变风云篇》,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77页。

广田弘毅内阁的成立,标志着日本法西斯体制的初步形成。

1936年8月7日,广田内阁召开了有首相、外相、陆相、海相、藏相参加的“五相会议”。会议通过了一个确定日本国策的纲领性文件——《国策基准》。这个文件规定,日本的“根本国策在于国防和外交相结合,确保帝国在东亚大陆地位的同时,向南方海洋发展”,并“充实国防军备”,“消除北方苏联的威胁,同时,防备英美,实现日满华三国的紧密提携”,“向南方海洋,特别是南洋方面(印度尼西亚方面)求日本民族的、经济的发展”。《国策基准》表明日本法西斯上台后,加紧了发动大战的步伐,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除全面侵华外,以苏、美、英为对手,进行太平洋战争的侵略计划。

1936年,日本陆军确定了1937年度对华作战计划,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用兵纲领》。《纲领》规定:在对华北作战时,要出动8个师,必要时还可能在华北5省同时作战;对华中方面,投入5个师,占领和确保上海、杭州、南京三角地带;对华南,仍按1936年度计划,大致动用1个师^①。1936年底,日本参谋本部次长西尾寿造中将,率领10多个将官在京都、名古屋地区,根据对华用兵计划进行图上军事演习。这说明,日本帝国主义筹划已久的全面侵华战争已进入具体准备阶段。

3. 日军增兵中国华北地区

日本军队驻在国外的有4大常备兵团,即朝鲜军、台湾军、关东军和华北驻屯军。

华北驻屯军由日本陆军部直接领导,它的司令官由军部直接任命,组织机构分两部分:一是驻屯军司令部,一是驻屯军部队。

驻屯军司令部是日本侵略中国华北的最高军事机关,设司令

^① [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部:《中国事变陆军作战》(1),朝云新闻社1975年版,第102—103页。

官1人,参谋长1人,高级参谋和副官若干人。

驻屯军部队,常编制为步兵队、守备队和宪兵队。步兵队队部相当于团,是步兵队、守备队和宪兵队的指挥机关。1936年以前,驻屯军设两个队部,分别驻在天津、北平。步兵队是野战军,是驻屯军的主力,由各步兵中队和小队组成。

华北驻屯军的编制和人数随形势的变化而变动。1935年,由于日本对中国华北地区的步步进逼,天津步兵中队扩大为4个中队,并增加了炮兵中队和工兵中队的新兵种,总兵力约2400人。

为了实现独占中国的野心,日本驻在中国东北地区的关东军,在侵占中国东北之后,兵力就逐渐伸向华北。1933年1月,侵占山海关;3月,夺取热河;3、4月份,又进攻长城各口。这时,日本华北驻屯军与关东军遥相呼应,积极配合,天津驻屯军司令部中村少太郎喊令便衣队扰乱后方,以配合关东军在长城各口的作战。5月底,《塘沽协定》签订,国民党南京政府事实上承认了日本对东三省和热河的占领,并进一步承认河北东部一带为非武装区。从此,整个华北处于日军监督之下。

随着日本对中国华北地区侵略的加紧,华北驻屯军在侵华中的作用,日益受到日本政府的重视。

1936年“二·二六”事件后,日本建立了军部独裁政权,广田内阁将关东军与华北驻屯军的权限范围作了明确划分:长城以外(北)地区,由关东军负责管辖,长城以内(南)地区事务,由华北驻屯军处理。4月17日,广田内阁会议正式通过向中国华北地区增兵6000人的决议,并得到天皇裕仁批准。18日,内阁发布第6号军令,将华北驻屯军司令官由军部任命改为“亲补职”(即由日本天皇直接委任),并增强约3倍的兵力;同时,将驻屯军的1年交替制改为永驻制。这些重要决定,都是为了提高华北驻屯军的地位和加强华北驻屯军的权力的。5月1日,裕仁天皇亲自任命田代皖一郎中将为华北驻屯军司令官。

增派到华北的日军,分别在5月9日、10日从于品港,22日、23日从新泻港上船运往中国。5月15日,首批新增日军3000人到达平津。16日,旅长河边正三少将把旅部设在北平。到了6月下旬,增派日军全部抵达平津各地。至此,强化华北驻屯军的工作完成。据东京日本政府宣布,增兵人数为6000人,加上原来驻华北的2400人,合计兵员为8400人。这是日本官方公布的被大大缩小了的数字,事实上,日本增兵华北的人数远不止此。据上海申报1936年9月的调查,华北驻屯军的人数已超过1.4万人,分驻于天津、北平、丰台、通州、山海关、秦皇岛、南大寺、唐山、塘沽、昌黎、湾东、留苏营及北宁路沿线各站。还有人指出,增兵后的华北驻屯军,兵力超过2万。

经过“强化”后的华北驻屯军编制,规模庞大,除拥有一个旅的步炮团(计3个连队)外,还有航空营、骑兵营、机器化学兵营、工兵连和驻防在铁路沿线的守备队、宪兵队,是一支兵种齐全、装备精良的武装力量,在中国华北驻扎,随时可以引燃战火,迅速夺取平津,攻战华北各地,用武力逼迫中国屈服,变中国为日本独占的殖民地。

日本政府不经中国同意,擅自向华北增兵,悍然侵犯中国主权,其真正目的则是为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作准备。当时,日本参谋本部总长闲院宫载仁解释说:这次增兵有两个目的,一是为了“防共”,二是为了“保护侨民”,这纯属借口。

4. 日本驻屯军加紧“演习”

为了进一步扩大侵华战争的需要,日本十分重视开发华北的交通运输业。1936年7月,日军在天津李明庄擅自建了一座新兵营,还修建了一个占地2000余亩的大飞机场,并附设一座能容纳10架飞机的机库。10月17日,日本为了得到在中国华北领空的飞行权,迫使宋哲元在北平签订了《华北通行协定》,规定航线有:①

天津——大连线；②天津——北平——承德线；③天津——北平——张家口——张北线；④北平——天津——锦州线。津连线与日本国内航线衔接；津承——津锦两线和伪满的空路相连；平张线则可以联络内蒙。这样就可以组成一个航空网，在军事上增加日本侵略华北的便利。

10月23日，根据协定在天津成立了中日合办的惠通公司，经办中日通航事宜。同时，日本还重视天(津)——石(家庄)铁路和塘沽海港的建设。

为了给日军提供经费，日本人在驻屯军的支持下，在华北从事大规模的走私活动。海上走私船只，停靠在山海关到北戴河一带，遇有中国海关巡艇干涉，日军就出面提出抗议。有时，中国的海关人员不但征不到税，反遭殴打，如果日本私贩受点轻伤，日方即要求巨额赔偿。有些日本私贩竟携带枪支，遇有中国缉私关卡检查，就开枪射击，甚至武装占领缉私关卡。日本华北驻屯军还通过走私活动，侦察地形、刺探情报、散布谣言，为军事行动服务。大规模的走私活动，破坏了中国的税收，给中国的财经造成了严重的损失。仅1936年4月的一个月的时间，因华北走私，海关税收就损失了800万元^①。

为了加强战前的训练，日本华北驻屯军频繁地进行各种军事演习，并对中国驻军进行武装挑衅。1936年7月9日，驻塘沽日军香川部队的30名步兵，乘小船在海河进行军事演习，他们把船划到东大沽，要求在那里登岸。东大沽是中国驻军29军刘汝明部第43师133旅刘团1营的防守地，因为事先没有接到日军进行演习的通知，中国守军理所当然地不允许日军上岸。日军不听劝阻，强行登陆，双方互相枪击，各有伤亡。后经双方军官出面制止，枪战停止。这就是“大沽冲突事件”。7月10日，刘团长奉命拜访日军香川

^① 张春祥主编：《卢沟桥事变与八年抗战》，北京出版社1990年版，第17—18页。

队长,向他表示歉意,张自忠等也向日本驻屯军参谋长永见俊德进行了解释,“大沽事件”才了结。

日本侵略者惯用的手法是先制造事端,作为口实,然后就采取行动,达到侵吞中国利益的目的。1936年6月27日,一名日本特务冲进中国驻军29军37师在丰台的马厰中,扬言在29军军营中的养马棚是他的私产,非要29军把马棚腾出来不可。29军立即找出证明书,说明这座马厰一直归29军所有,而且是29军自己建造的。但日本特务不服,立即从腰间拔出短刀动武,并指示全副武装的日本兵二三十人,手持刺刀帮打,中国官兵忍无可忍,只得还手自卫,双方发生械斗,双方都有人负伤。事件发生后,日本驻屯军以此为借口,向宋哲元提出抗议,向中方提出4项无理要求:道歉、赔款、惩戒肇事军官、自丰台撤兵。宋哲元除拒绝从丰台撤兵外,接受前3项要求,并同意把同日军发生冲突的中国军队调防。7月1日,29军37师109旅217团3营调驻北平西郊颐和园营区,同师的110旅600名官兵在蒋华延旅长带领下进入丰台防区,此事才算了结。

但日军并不死心。1936年8月31日,日侨森川太郎无故闯入29军丰台驻军兵营内寻衅,与守卫士兵发生斗殴,被刺受伤。日本又以此为借口,再次提出要29军让防。宋哲元派人与日方交涉,答应赔款、惩办打人凶手。然而日方不予理睬,以“驻丰台日军感受到29军威胁”为由坚持要求让防。9月18日下午,冯治安混成部队2营5连孙香亭部在铁道附近进行野外训练,6时整顿归营。途中,正好遇上日军的一个连队也演习完毕回营房,两支军队在丰台正阳街相遇,由于道路狭窄,两军不能同时通过。日本军队要夺路先行;我方战士义愤填膺,也不肯相让,于是两军在途中对峙。日军排长带领两名日本骑兵冲进孙香亭连的行列中,中方士兵被马冲闯踩踏受伤,用枪托击马。日本指挥官说中国军队侮辱了日军,立即令其部队散开,将孙香亭连包围,并要解除孙连士兵枪械,孙香亭